# 第五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結果

### 一、本文重要觀念說明

誠如本文第一章所述，本文的研究問題與目的，旨在說明「媒介環境」及「工具使用差異」對人類口語表達行爲的影響，並提出一套以「媒介環境」及「工具使用差異」爲出發點的口語表達行爲解釋架構。換言之，理論架構是我研究的主要問題及結果。

而在本文中，透過文獻探索及十五位報導人口語表達行爲的田野觀察，我也提出了一套以「媒介文化」及「文化工具箱使用差異」爲出發點的口語表達行爲解釋架構，在第四章中，並透過阿玉這個個案，進一步說明此解釋架構，即「不同的媒介文化，會形塑不同的文化工具箱，在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行為中，人們即是利用這些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但反過來說，這些文化工具箱，也會限制及影響人們的所思所為。」。在此，我將本文研究結果的幾個重要觀念，再做進一步的說明及延伸：

#### （一）非媒介單一因素，而是整體文化情境影響人類思維與口語表達

前面談到，我的研究起始點爲 McLuhan「媒介就是訊息」的概念，即媒介不只是種人類使用的工具，且在使用各式媒介的過程中，我們的生活及思考方式，也產生重大變化。使用不同媒介工具的人，其思維及生活是以不同方式運行著，故而如果依照 McLuhan 的說法來看，不使用文字做爲溝通思維工具的文盲，其思維與溝通方式，與受過文字教育的識字人是有很大的差異。在本文中，我並引用了 Luria(1976)有關文盲的研究，說明「文字」媒介的使用對於抽象、邏輯推理、分析等高等心理智能的促發。

但在田野觀察中，我卻發現這些不使用文字做爲思考溝通工具的報導人，在口語表達過程中，也能某個程度展現抽象、邏問推理及分析等思維能力，且從文

獻搜尋的過程中，我也發現影響人類心智思維與口語表達的因素，除了媒介工具外，尚包括了教育、文化情境、生長環境、語言情境等因素。換言之，溝通思維工具箱的使用，雖會影響人類心智思維與口語表達行爲，但除了「媒介使用」這個單一因素具影響性外，我們尚需考慮文化情境中其他相關的教育、社會文化、語言情境等因素的影響性。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我採用了 Ong(1982)的口語/文字/電子文化概念，即強調人們所處整體媒介文化情境，對其思考方式和口語表達行爲的影響，以解釋田野研究中所觀察到的現象。事實上，就如 Finnegan(1988)所言，在一文化系統中，媒介使用、社會文化、教育、語言系統、生長背景這些因素，是緊密結合，不可切割且彼此互相影響。媒介的發展與使用，可能造成其他相關因素的發展，進而導引出更巨大的社會及思維變遷，但其他文化因素的發展，也會限制及影響媒介工具的發明及使用。故而環境中所有因素，可說是處於一種「相生相長」、「相互建構及影響」的狀態下。而在探討所處文化情境的影響時，我們絕不可將媒介工具的發展與使用，與其他相關環境因素完全分離，而需以一個整體文化概念思考。只不過在本文中，我認爲影響思維和口語表達行爲最巨的，仍是思維溝通工具，故而我以口語/文字/電子文化等概念，來說明所處的文化情境。

關於這個「非媒介單一因素，而是整體文化情境影響人類思維」的觀念，在第四章中我並透過阿玉個案的分析，進一步提出說明。在阿玉的個案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不識字的阿玉在口語表達時，不只會使用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角色扮演工具箱」來達成其目的，同時某個程度也能有效的運用文字/電子文化的「分析式思考」、「抽象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資訊搜集與記錄」等文化工具箱，來達成其意圖。

換言之，不使用「文字」媒介做爲思維溝通的人，不見得如 Luria 所述，不具分析、抽象和邏輯等思維能力，因爲就如 Ong(1982)所說，是整體的媒介文化環境，而非單一媒介工具的使用，形塑了這些文化工具箱，故而長期處在文字/電子文化環境下的阿玉，即使不用文字這個媒介做爲思維溝通工具，也能擁有某

些文字文化的工具箱，像是「分析式思考」、「抽象性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

（二）媒介工具是種文化產物，媒介工具的使用具有文化意涵

不過，如果依照 Ong 的說法，人類在與媒介環境互動過程，顯然處於一種被動狀態，人類的思維與表達行爲，完全受其所處的媒介環境影響，這令人不禁要問，在這種單向影響下，人難道沒有自主的能動性，完全只能受環境的宰制嗎？而如果情況並非如此，人與週遭文化環境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在第三章一、二節中，透過文化與心靈互動關係的文獻探討，我除了說明「文化與心靈是處於相互依賴，及互相定義的狀態」外，並透過文化-心靈中介物概念的提出，進一步說明兩者間的關係，即在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行爲中，我們會利用這些文化-心靈中介物，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但反過來說，這些文化-心靈中介物，也會限制及影響人們的所思所爲。換言之，透過中介物概念的引進，可進一步具體說明，人類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既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同時某個程度仍會受制於所處情境。

在此，我進一步將文化-心靈中介物，定義爲文化工具箱，指的是那些人類日常生活中，用來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或意圖的各式工具。我認爲，所有的媒介工具，都是種文化產物，是透過其文化環境形塑與發展而來，不同的文化環境，會形塑不同的文化工具箱，故而口語文化的環境，很可能發展及形塑出不同於文字文化的文化工具箱。

至於口語文化及文字/電子文化所形塑的工具箱各爲何？在本文中，透過文獻探索及十五位報導人的田野觀察，在第三章第五節中，我提出了一些暫時性的觀察結果。在口語文化的環境部分，因受限於記憶工具及普同知識架構匱乏等因素，我認爲比較可能會發展及形塑出「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角色扮演」等文化工具箱；在文字/電子文化情境中，則因爲資料大量的累積，文字媒介的頻繁使用等因素的影響，故而容易發展及形塑出「分析式思考」、「抽象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資訊搜集與記錄」、「精確測量工具」、「抽象圖式思考工具」等文化工具箱。

而因爲文化工具箱大半具有某種程度的系統性及階層性特質(Sheffy，1997)，故而在第三章第五節中，我透過實際的田野觀察及文獻探索，進一步具體說明各個文化工具箱的階層分佈情形，例如，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箱下，尚有俗、諺語等文化工具箱，在俗、諺語的文化工具箱下，又包含固定、韻律平衡、重複等表達工具。

另外，我也特別強調，媒介工具的使用具有文化意涵，因爲在思考或使用某個媒介工具時，我們很不將自己的詮釋意義加諸於上，而人類的詮釋又深受文化情境的影響，每個媒介工具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又可能具有不同的意義，故而沒有一個普同的中介物意涵，存在於世上，媒介工具的使用，必有其文化意涵。

（三）文化工具箱的使用，是種選擇過程

除了強調媒介工具是種文化產物，是透過所處文化形塑而來的外，另外我也特別強調，文化工具箱是以多元共存且成套的方式存在。在解決某一問題時，我們腦中同時可能存有多個甚至相互衝突的文化工具箱，人們即是利用這些共存的多重文化工具箱，選擇出適當的問題解決工具。故而我們可以說，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人們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

關於這個「多重文化工具箱」的選擇概念，在本文中是個相當重要的概念，除了因其更具體說明了人類處於環境限制下所具有的能動性外，也因其對於問題解決結果的多元性，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就是因爲這些多重文化工具箱及常備劇目的存在，故而即便身處於同一文化情境下，不同的人在面對同一問題時，仍有不同的問題解決策略。

事實上，在實際田野觀察中，我發現這群共同生長於口語文化，且身處在目前這個口語/文字/電子混血文化中的報導人，在面臨同一問題，或想達成某一目標時，雖然也許擁有相同的媒介文化工具箱，但每個人所選用來解決問題的文化工具箱卻不盡相同，像是在敘述故事時，李嬸較常使用的是角色扮演工具，但王媽則是比較常引套語工具來做說明；而即便是同一個人，想達成同一意圖，

但在面臨不同情境時，還是可能使用不同文化工具箱以解決其所面臨的問題。像是在第四章中我們的個案阿玉，雖然同樣在議論事情時，且阿玉腦中同時具有「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分析式思考」等文化工具箱，但阿玉還是會視情況，選擇使用某個特定的文化工具箱。換言之，就是因爲腦中具有多重的文化工具箱，故而在解決問題時，人們才能相當程度的自主使用不同的策略來解決問題。

（四）文化工具箱的使用選擇，是種偏向行爲

雖然前面談到，不同的媒介文化會形塑不同的文化工具箱，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即是利用這些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但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本文的口語/文字/電子文化的分類並非是個截然二分的概念，而是以一種連續和混合體的方式存在。

事實上，現存文化中，大半同時包含了口語、文字和電子文化的作用，只不過不同的媒介文化，在其中所造成的作用力有其大小罷了。因爲交通的發達，許多傳教士及人類學者，已將各式的電子媒介帶到原始步落，而也如前面所述，文化的發展是種傳承的過程，在電子文化中，我們仍難避免受到口語和文字文化的作用力，現在要說有一個所謂的純口語文化或電子文化的存在，已不太可能。故而我們只能說某個文化較「偏向」口語、文字或電子文化的樣態，而不能說某個文化就是口語或電子文化。

同樣的，媒介文化工具箱也是種「偏向」概念，亦即，文化工具箱的形成與使用，並非處於一種截然二分的狀態，而是種習慣的傾向，故而某些文化工具箱，也許較常在口語文化偏向或口語人身上使用，但並不意謂著文字/電子文化偏向或文字/電子人，就不使用這些文化工具箱，只不過相對上來說，使用的技能和頻次可能少了些。

至於這個文化工具箱使用的選擇偏向，主要與我們的生活/生長環境有關，生活/生長於某媒介文化中人，因爲從小到大就身處在一個使用該文化所形塑的

文化工具箱的環境中，故而也會偏向選用該文化所形塑之工具箱，且使用技能較佳。

事實上，在實際田野觀察中，我發現雖然同時擁有口語和文字/電子文化工具箱，但這十五位報導人在口語表達時，最常使用的還是口語文化工具箱的各個工具，且使用技能和層次也較佳較深。例如，雖然阿玉會視情況及其欲達成的意圖，在其腦中的多重文化工具箱中，選擇使用某個文化工具箱，不過阿玉的文化工具箱使用情形，還是有其習慣與偏向。像是在議論事情時，雖然同時擁有「套語工具」、「文化價值觀」、「分析式思考」等工具箱，但阿玉還是較「傾向」使用口語偏向文化的「套語工具」及「文化價值觀」等口語文化工具箱，且在口語文化工具箱的頻次、階層及技能的使用上，較識字人來得多且好些。例如阿玉日常生活中自創的許多話語和即興創作[1]，就使用了套語工具箱第二階層的對仗、押韻、頂真、重複等文化工具。

但在使用文字/電子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及達成意圖的頻次、技能與工具箱的使用階層上，可能較土生土長於文字/電子文化的文字人，來得少及淺。例如：雖然有本屬於自己的電話簿，但由於沒有更進一步的分類概念及文字工具，所以阿玉還是停留在工具箱第一階層的使用，其電話簿只出現一長串的數字，不太使用第二、第三階層較深入細緻的「姓名」、「出生年月日」、「關係」等概念分層、分類系統，幫助號碼的記憶與使用。

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使用傾向的實作技能，很可能是因爲這些報導人從小生長在口語文化環境，且其目前所處的情境大半都是大家庭制，人際互動非常密切

[1] 在進行田野調查時，我曾經採訪一個八十幾歲的文盲，她是個愛唱歌的老人，我去採訪她時，她邀我在她家一起唱卡啦OK，因爲不會說國語，她唱的大半是閩南語歌。不過雖然不識字，但是每首歌的歌詞和韻律節奏，她都記得很牢，不會出錯，在看她唱歌時，我常會懷疑她是不是騙我不識字，因爲她唱歌的節奏及歌詞，是跟電視螢幕下方出現的字幕完全一致，再加上我自己在唱歌時，通常會跟著這些字幕出現的標誌唱，所以當她的歌聲與字幕一致時，我真的有種錯覺，她是識字的。在我要回家時，她告訴我她自己創作了好幾首歌，並唱給我聽，她寫的歌也是閩南語歌曲，而且每首歌詞都押了韻，我那時非常驚訝，心裡想，我們一般識字的人，雖然受過那麼多的文字教育，但有沒有能力從事詞曲創作都是個問題，何況是將每句歌詞都讓它押韻了，這似乎已達到一個專業詞曲創作者才有的水準。

頻繁的口語文化偏向的環境，透過週遭這些口語媒介文化情境的促發及日常生活中不斷的實作練習(practice)，形成她們較習慣和偏向使用口語文化工具箱來解決問題，且在口語文化工具箱的頻次、階層及技能的使用上，較識字人來得多且好些。

（五）我們所使用的文化工具箱，也在不知不覺中，影響我們所思所為

不過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雖會使用不同的媒介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但就如我的解釋架構所說，在使用文化工具箱的同時，這些文化工具箱，也會反過來影響我們的思維及口語表達行為，使其出現某種特殊的樣態。

以第四章阿玉的個案分析為例，阿玉雖然經常選擇使用口語文化的工具箱來解決問題及達成意圖，但口語文化的「套語工具」，在阿玉的日常生活及口語表達行為中，也不知不覺的在影響著她，故而使其表達行為，充滿了對仗、押韻、重複等情形，並以一種「富韻律節奏」的方式呈現，只不過她並不那麼意識到這件事。

而阿玉的這些行為反應就如研究一開始我們所述 McLuhan「媒介就是訊息」的說法，媒介的使用對人們的思維及其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只不過在本文中，我所界定的媒介工具，已經不再侷限於傳統傳播學中所定義的大眾媒介或物質工具，而是將其定義為，人們用來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的文化工具箱，是那些經由媒介文化情境所形塑的生活風格、習慣或技能工具。

二、我是用心肝想的

在論文一開始我曾經說道，引發我研究文盲「口語表達行為」的動機，在於阿玉對於我所提運算問題給的答案-「我是用心肝想的」，因為這個答案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所以我決定以其口語表達行為，做為研究的觀察重點。那麼在本文中，我該如何利用我的解釋架構，去解釋阿玉的這個口語反應？

如果依照 Luria(1976)的說法來看，阿玉之所以會這樣回答，是因為她的心智

技能發展較差，不會使用文字思維工具，故而無法回答這種抽象需要後設分析的問題。不過在本文中，我並不接受這樣的解釋，我認爲阿玉之所以會做這樣的回答，並不是因爲她的心智發展較低等，而是因爲她所處的媒介環境，並不需要，也沒有形塑我所要的文化工具箱供她參考，故而她不知如何回答。而她的這個反應就如同 Swidler(1986)和 Ong(1982)所言，當一個人對於可接受技能、風格及如何去做這件事完全不熟悉時，他根本上不會去想像這個問題，自然所能做出的反應，就會在我的預期之外。

故而，如果依照本文解釋架構來看，對於算術運算過程的問題，並非阿玉沒有能力回答它，也不是她的答案有錯，或是她的思考尚未發展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階段，而是更可能的是，在她所生長及生活的環境中，我所提問的問題，根本上是個很少人關心的問題，且沒有人會以那樣的方式問她，甚或她不具備回答那個問題的文化工具箱，所以她不曾想像，也不會以我所「習慣」的方式做答。事實上，阿玉確實回答了我的問題，而她也自認爲回答了我的答案，所以在我第二次提問同樣問題時，她才會又給一樣的答案，對她來說，她的答案確實沒有錯，只不過不是我預設及想要的答案罷了。

那麼現在我們該問的，不是阿玉有沒有能力去回答這個問題，及其答案的對錯，而是爲什麼，我會有這些預設和想要的答案，及我和阿玉之間的對答狀況，又爲什麼會以那樣的方式進行呢？

以本文的解釋架構來看，在這個對話例子中，我之所以會有這些預設和期望的答案，及我和阿玉之間的對答之所以會以這樣的方式進行，主要是因爲，我們各自使用了自己習慣使用的文化工具箱，及受到這些文化工具箱的影響。現在讓我們回到最前頭的對話：

一開始，我的作法是提出一些類似小學數學課本裡的應用問題，請阿玉告訴我問題的答案。像是我問阿玉買五十三塊錢的東西，付一百元會找回多少錢？結果阿玉想了一下，告訴我答案是四十七塊；我又問她，買了三十七塊的水果，再買二十四塊的青菜，總共要付多少錢，阿玉很快的回答我說，六十一塊啊。

在發現她具有相當程度的運算能力後，我接著提了一個好奇已久的問題，即不使用文字和符號做爲思考工具的她，腦中是怎麼進行算數運算的。我說：「妳是怎麼算的」，阿玉回說：「我是用心肝算的」，我覺得她是不是聽不懂我的問題，所以又換了個問法，企圖讓她更知道我在問什麼，我問她，「那妳的頭腦裡是用什麼東西先做什麼，再做什麼？」，她回答說，「沒有啊，就是這樣算，這有什麼好問的」。最後，我實在太好奇她腦中呈現的到底是什麼？，於是我大膽的問她，「妳頭腦裡有沒有出現什麼東西」，她回答我，「沒有啊，哪有什麼東西」。

從上面的提問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我一直在問的是個「腦中符號搬運過程」的問題，所以我才會向阿玉問「那妳的頭腦裡是用什麼東西先做什麼，再做什麼？」、「妳頭腦裡有沒有出現什麼東西」。

事實上，在提問這些問題時，我腦中呈現的，是自己在運算過程中經常使用的「直式運算圖示」，亦即，我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主要是因爲我使用了文字文化中對於數學問題的解決工具-「直式算數圖示」，再加上當時的我又認爲，只要會算數的話，每個人應該都會有那樣的一個搬運圖像的過程，即便阿玉沒有數字這樣的符號工具，她應該還是會使用其他的工具來做運算，像是錢，所以她還是應該回答我一個運作過程。

但是我並沒有意識到，沒受過文字教育的阿玉，腦中並沒有那樣一套「圖示運算過程」的文化工具箱，即便是我所想像的錢，或是一個符號的搬運過程，仍是以一種「視覺圖形」的方式呈現，對於阿玉這個長期以口語、聲音媒介，思考和溝通的人來說，不是她文化工具箱裡的工具，所以我再怎麼追問，也問不出「我要」的答案。

當然，這並不意謂著她就沒有數字運算的過程，因爲在我的田野觀察過程中發現，她確實會做簡單的加減乘除運算，且幾乎每次運算的答案都是正確的，只不過她腦中的運算方式，可能與我的方式非常的不同，而且在計算數學問題時，

她所使用的文化工具箱，也可能與我所使用的完全不同[2]。

換言之，就如同本文解釋架構所說，「在不同的文化中成長，可能具備不同的工具箱，而不同生長背景和智能發展的人，其使用工具箱所建構的行動策略也不相同」。在與阿玉互動的過程中，深受文字文化影響的我，使用了「直式運算圖示」這個文化工具箱來做提問，我希望透過它來達成了解阿玉數學運算過程的目的。但是沒有「圖示運算過程」工具箱的阿玉，根本無法了解我的提問，所以就給了一個我自認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答案，「我是用心肝想的」。

當然，我對於文化工具箱的使用，是否真的如自己所想的那麼自主及有意識，答案當然是否認的，因爲事實上，在提問的過程中，我並未意識到自己所提的，是個「圖式運算過程」，我只是很自然的覺得，每個人只要是有數學運算過程，在其腦中都會有個事物搬運過程。

而且如果我真是那麼自主的選用「圖式運算過程」這個文化工具，那麼我就不會覺得阿玉的反應是那麼的奇怪，因爲我該知道還有別的文化工具箱是可供選擇，我也應該可以接受阿玉的說法才對。就是因爲我受到文字文化及我所使用的「直式運算圖式」工具箱的影響，認爲在每個人說明這個問題的方式，都應該以圖示運作的方式呈現(不管是符號或是錢)，所以我才會覺得阿玉的反應是很奇怪。

換言之，這個例子某個程度亦可符合本文的解釋架構，即「不同的媒介文化，會形塑不同的文化工具箱，在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行爲中，人們即是利用這些文化工具箱，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但反過來說，這些文化工具箱，亦會限制及影響人們所思所爲」。

只不過在這個例子中，我強調的是，在口語表達行爲中，我個人對於「圖示文化工具箱」的使用，及其對於我在有關算數問題提問與解決時所造成的影響。即在文字/電子文化生活下的我，具有且使用圖示文化工具箱解決我個人日常生

[2] 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我發現口語人也會使用一些數學原理工具，來解決其日常生活所碰到算數問題，像是我們常用的九九乘法「表」(圖示)，在口語文化也有，只不過在口語文化中，它並不是以圖示的方式呈現，而是以一種聲音、韻律的方式被複誦，她們將這種以聲音唸出的九九乘法工具，稱之爲「含口仔算」，即含在嘴巴裡算的意思。

活所面臨的算數問題，但也因爲太頻繁去使用這個圖示文化工具箱，使得我忽視了其他運算機制的存在，而在提問有關運算過程問題時，不斷提出一些「腦中符號搬運過程」問題，並且深深的認爲，只要會算數的話，每個人應該都會有那樣的一個搬運圖像的過程，故而當阿玉回答，我是用心肝算的」，我才會覺得如此震撼。

## 第二節　研究價值

那麼，我這個解釋架構，除了某個程度可以解釋口語表達行爲外，它對於傳播研究有何意義呢?現在，讓我們回到故事的最前頭，看看引發我最早思維的McLuhan「媒介就是訊息」的說法。

在傳播學上，McLuhan 最經典的名句爲「媒介就是訊息」，這句名句召示了傳播研究的新里程碑，讓學者將研究目光由早期的傳播「內容」，轉向傳播工具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性上，也引發後續學者對媒介工具與人類思維互動關係的關注。其後針對媒介工具對人類思惟的影響，Luria(1976)更進一步透過實地實驗的方式，得出了「不使用文字媒介做爲思考和溝通工具的文盲，不具有抽象思維、自我分析及邏輯思考等思維能力」的結論。

然而在本文中，透過文獻探索、十五個報導人的觀察及阿玉的個案說明，我們可以發現，即便不使用文字這項媒介，做爲思維及溝通工具的文字時代口語人，她們的口語表達行爲，仍具有某種程度的抽象、分析及邏輯推理歷程，且會使用各式「文字/電子文化」的工具箱。

換言之，回到第二章我所主張的，物質性的媒介工具，或許是影響人類口語表達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絕非唯一的因素，因爲透過其他文化環境因素的促成，即便是不識字的文盲，也能具有某種程度的分析、三段式邏輯推理及抽象思考能力，且能選擇性的使用這些文字/電子文化的工具箱，以達其意圖。而阿玉這個例子，正某個程度駁斥了那些媒介單因者的論述，因爲事實上，並非只有媒介單一因素，即可促成人類思維的發展與口語表達行爲的變化。

當然，在本文中，我並非否認媒介工具所加諸於人類心靈與社會的影響力，我也同意媒介工具的使用，對人類思維及日常生活的表達行爲，確實會造成重大的影響，且這種影響不見得爲我們所知覺，故而才會使得阿玉在口語表達中，不自覺的使用各式富韻律節奏的「套語工具」文化工具，甚而在說明電話號碼的記憶及辨視時，也以「三段式邏輯推理」工具箱，來做推理而不自覺。

只不過在文中，我所界定的媒介工具，已經不再侷限於傳統傳播學中所定義的大眾媒介或物質工具，而是將其定義爲，人們用來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的文化工具箱，是那些經由媒介文化情境所形塑的生活風格、習慣或技能工具。我不認爲這些文化工具箱，具有如 Luria(1976)年所言的，放諸四海皆準的物質概念，而是將其視爲是一種媒介文化的產物，是會隨情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涵及作用。

換言之，我最主要的貢獻，在於我不只從麥氏(1964)所言「媒介就是訊息」的概念著手，強調媒介使用對人類思維和行爲的影響性，且更進一步延伸其媒介工具概念，將媒介使用與其他相關文化因素做一結合，以整體單位的「媒介文化」及中介文化與心靈的「文化工具箱」概念，來分析人類的思維與口語表達行爲。並進一步提供一套更爲完整的分析解釋架構，來解釋及說明，在口語表達行爲過程中，人們對於文化工具箱的選擇過程，與工具箱所加諸給我們的限制及影響。

這對於長期將研究重點集中在媒介內容的傳播研究來說，可說是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因爲我不只將研究問題回歸到「人與媒介環境互動關係爲何」的這個根本卻少人研究的傳播問題上，且更進一步將麥氏的概念做進一步的具體延伸，使其不再只是個概念，而是可以透過文盲口語表達行爲的觀察，得到實證操作，甚而是個更完整的解釋架構，可供後續對此問題有興趣的傳播研究者，做進一步的發展。

而這個整合了教育、文化、語言、媒介等相關因素的「媒介文化」概念，及中介人類心靈與所處文化情境的「文化工具箱」概念的理論架構，對於人類的各式行爲表現，將具有更強大的解釋力及正面意義，因爲它不再是以一種單因子及

決定論觀點，來看待人類心靈與所處環境的問題，透過整體環境及中介文化工具箱的提出，我們將可更全面及正面性的了解，人類與所處情境間的互動關係。

另外，經由文化工具箱內涵及概念的說明，透過對於媒介工具的重新定義，也將開啓新的媒介研究取向，使傳播研究不再侷限於傳統物質媒介工具，及單向決定論的觀看角度，只將研究焦點集中在大眾媒介工具對人類社會、認知和行爲的影響探討上，而是可以轉而進一步將研究焦點放在人類與媒介環境互動關係、人際互動過程中，文化工具箱的形塑與使用、各式文化工具箱的使用與設計等相關議題的討論上。

例如，在不同的人際溝通過程中(像是爭辯)，我們是如何使用這些文化工具箱，來解決問題，達成我們的意圖；又如，文化工具箱的成套及具階層的概念，將可做爲未來各式媒介文化工具箱在設計時的發想及理論依據等。故而，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這個研究，某個程度正在爲傳播研究，開創一條新的道路。

## 第三節　未來建議

前面談到，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從媒介使用的觀點，提供一個解釋口語表達行爲的初步架構，而在本文第三章中，我也透過文獻探尋及實際田野觀察的思想反覆激盪中，提出一套初步的理論架構，即利用媒介文化和文化工具箱的概念，解釋人類的口語表達行爲。

雖然我在第五章中，利用了阿玉這個個案，說明了本研究的解釋架構，看起來似乎言之成理，但是在此還是必須說明的是，本文屬於初探性研究，在文中有許多假設及論點，乃是我自己依據文獻及初步觀察，所提出的想像，這些想像雖有其理論與實證的基礎，但仍有許多盲點與缺失。而這些盲點和缺失，我不見得能在短期內發現，還有待其他研究者共同努力發覺與指正，以使本研究所提理論架構更爲完善。

在此，我提出一些個人在研究過程中，自覺不足之處，及未來研究者可進一步思考的方向。

首先，在第三章文化工具箱的特色說明中，我曾經談到，文化工具箱是處於一種動態形成的過程，而非一種靜態現象，故而我們亦可從歷史性觀點，去追溯其移動路徑。雖然在研究過程中，我深知文化工具箱是處於一種動態形成的狀態，但事實上，在個案說明中，有關阿玉所處媒介情境對其文化工具箱的形塑過程，我卻無法以一種動態的方式，加以說明。

一來是因爲阿玉的年紀已大，她的大半文化工具箱，在早年所處文化情境即已形成，故而我很難觀察其形塑過程。其次，文化工具箱的形塑過程，也非如此明顯可觀察，因爲大半情況下，阿玉所遭逢的環境變遷，都很緩慢，甚而是個理所當然的過程，例如，別人家有了電視，偶爾阿玉會到鄰居家看電視，有天，兒子也買了台電視，對於阿玉來說，這也算是個可被接受的狀況，故而要在短短的一兩年內，對其文化工具箱的形塑過程，做出說明，實在是件難事。

事實上，媒介文化工具箱的形塑，確實不是那麼明顯可觀察的，而有關文化工具箱形成過程的相關研究中，也常以一些較爲明顯可觀察的情境或難題，做爲觀察的場域。例如 Morawska(2001)曾針對波裔非法移民在德國文化情境下，是如何在德國這個大情境及其自身所處的波蘭移民次文化情境下，利用原先固有的文化工具箱，發展出一些新的文化工具箱，達成在德國非法打工的目的，就是一個很好的文化情境形塑工具箱例子。因爲通常在不太熟悉或是不太勝任的文化情境下，人們會積極利用其舊有的文化工具箱，發展出新的問題解決策略。甚而會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形塑出一些新文化情境中才會有的文化工具箱。所以觀察情境的選擇，在文化工具箱的研究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涵。

故而如果我想觀察阿玉某些文化工具箱的形塑過程，那麼我選擇的情境就不該是阿玉從小到大居住的情境，因爲在這個情境下，她已經非常習慣，甚而建立起一套屬於自己的生活劇本和媒介使用劇本，我是很難觀察到她文化工具箱的形塑過程。事實上，我也並非沒有機會觀察阿玉某些文化工具箱的形成過程，例如，這幾年阿玉偶爾會到大陸小住一段期間，其實我也可以跟著一起去，只不過在研究當 時，我並未發現這個問題，而且這也不是我這個研究要處理的重點，故而

我想這部分的觀察，或許可成爲我未來進一步思考的研究方向。

其次，在前面我們曾經談到，日常生活中，我們所使用文化工具箱的內涵，大半具有某種程度的系統性及階層性特質(Sheffy，1997)。換言之，在本文中所提出的各式媒介文化工具箱，應該大半都有其內在的系統性和階層性，尤其是，如果依照 Swidler(1986)的文化工具箱概念來看，具長期文化發展歷程的口語文化工具箱，其工具箱內應該會有更完整和具階層的各式文化工具元素才對。

事實上，我們確實看到了某些文化工具箱的系統及階層性，例如在口語文化所形塑的「套語」文化工具箱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下還有押韻、頭韻、重覆等修辭工具；在文字文化的「資訊搜尋與記錄工具」文化工具箱中，我們看到了各式協助記憶的文化工具，像是圖書館、備忘錄、百科全書等，當然單是圖書館這個文化工具下，可能又可再細分出相當多的概念及工具。

但是，大半來說，本文關於這些媒介文化工具箱的內涵說明，都還停留在一個較粗淺的架構，像是「角色扮演工具」、「分析式思考」等，還是停留在初步的概念描述，未見更多實質內涵，而即便是「套語工具」，都還有相當大的說明空間，需要去填滿。在這個部分，我曾經花了一段時間去進行文獻搜集及田野觀察，不過目前看來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而這部分，有待後續研究者和我一起努力。

另外，就如在研究價值時，我們所談到的，經由將媒介工具重新定義爲文化工具箱的過程，我們也開啓了新的媒介研究取向，使傳播研究不再侷限於傳統物質媒介工具及單向決定論的觀看視角，而是可進一步將研究焦點放在，人類與媒介環境、及在人際互動過程中，媒介文化工具箱形塑和使用、各式文化工具箱的使用與設計等相關議題的討論上。

關於這個部分的傳播研究，我認爲可以再延伸成三大研究區塊，第一部分，我們可以針對傳播媒介環境對於媒介文化工具箱的形塑過程，做更深入探討和說明，例如，一個新進入媒介環境工作的記者，在媒介工作環境下，會取得哪些文化工具箱，及如何取得與使用這些媒介文化工具箱，來解決其所遭遇的問題。

第二部分，我們可針對媒介文化工具箱的內涵、使用情形，及其所造成影響，

做更進一步的探討。例如在何種溝通情境中，人們會使用哪些文化工具箱？而這些文化工具箱，又對其言行產生什麼影響？在哪些情境下，我們又會較常使用什麼文化工具箱？關於這部分的問題，我認爲是人際傳播研究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但一直以來卻少人關注。

第三部分，我們可利用本文所提有關文化工具箱的理論說明及論述，做爲未來各式文化工具箱實務設計時的參考。前面我們曾經談到，大半文化工具箱中，都內含不同層次的成套文化工具箱，通常越次階層(第二階層)的文化工具箱，所涉入的技能和知識越專精與深入。關於這些文化工具箱的各式概念與說明，我認爲是未來實際設計各式媒介文化工具箱時，一個可發想及說明的理論依據等。

事實上，我們目前所使用的各式文化工具箱(例如：錄放影機、手機、搖控器等)，大半是透過工程師或設計者依據科技發展及個人想像而來，並無一套理論及解釋依據，故而在使用上對於不同背景的人會造成不同程度的不便。像是對於某些人來說，錄放影機的按鍵設計太過複雜，使得他/她只會使用某些功能，並無能力使用機器上提供的所有功能。

關於這個問題，除了與使用者文化工具箱的次階層知識短缺有關外，另外也與文化工具箱設計者的設計概念有關。許多設計者在設計時，並未了解工具箱的階層特性與使用技能間的關係，且未針對使用者的知識背景和使用習慣做一探討，只單純由設計者的使用習慣出發，造成使用者在使用上相當大的不便。故而，如設計者能針對工具箱的特性及使用者的知識背景與使用習慣，做進一步了解，相信必可設計出適合更多人使用的文化工具箱。甚而在未來，也可針對不同的族群，設計其專屬的文化工具箱，像是專屬於口語人的電視搖控器，讓口語人不只會變換頻道，也能進一步調整電視畫面的視訊，使用更多的功能。

總結來說，關於人類心靈、媒介文化及媒介文化工具箱的互動關係，還有太多未知的空隙，正等著我們來填滿，而這個研究只是個起點，不是終點。